吴庆棠·著

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illegible]
封面设计　[illegible]

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
吴庆荣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illegible]）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illegible]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illegible] 印张 [illegible] 字数 [illegible] 千字
1997年[illegible]月第1版　1997年[illegible]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illegible]
ISBN 7-[illegible]-[illegible]/C·[illegible]
定价：15.00元

目　录

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从中国到新加坡…… 1
第一节　基督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1
第二节　传教士办报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出现…… 6
第三节　郭实腊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10
第四节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广州 …… 15
第五节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新加坡复刊 …… 17
第二章　新加坡华人创办的第一张华文日报——《叻报》…… 21
第一节　《叻报》的诞生 …… 22
第二节　《叻报》的出现与华人社会 …… 26
第三节　华人薛有礼与《叻报》…… 41
第四节　来自香港的“南洋第一报人”…… 44
第五节　开创中国报人南洋办报之风 …… 54
第三章　辛亥革命与新加坡华文报业 …… 58
第一节　19 世纪末期出现的华文报纸…… 58
第二节　辛亥革命前后蓬勃发展的党派报纸 …… 65
第三节　革命派报纸与保皇派报纸的大论战 …… 80
第四节　孙中山与新加坡华文报刊 …… 89
第五节　活跃在新加坡华文报坛的中国文化人 …… 95
第四章　抗日救亡与新加坡华文报业…… 111
第一节　大批中国文化人南来新加坡…… 11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第二节　中国文化人与新加坡华文报业…… 137
第三节　新加坡的中国党派报纸…… 170
第四节　抗战前后华文报的中国新闻…… 187
第五章　陈嘉庚、胡文虎与中国报业 …… 200
第一节　陈嘉庚与中国报业及报人…… 200
第二节　胡文虎在南洋和中国创办星报系…… 230
第六章　中国的变革与新加坡华文报业…… 240
第一节　报人与报纸认同的转变…… 240
第二节　语文环境与华文报业的发展…… 246
附　录　中国图书馆藏新加坡华文报刊…… 272
第一节　新加坡出版的华文报刊传入中国…… 272
第二节　中国图书馆藏的新加坡华文报刊…… 275

序

两年前，吴庆棠向我谈起他的科研计划，打算搞点海外华文报业方面的研究，请我指导。指导不敢当，借此机会接触一下这个新的领域，于我亦有裨益。于是欣然从命。吴庆棠科班出身，当过新华社记者，又主编过杂志经年，后来转入上海社科院的新闻研究所；因而具备了理论和实践的有利条件。多年来我曾想过一个问题，在中国现代史的著述中，华侨华人史都异常单薄。与此相关，解放后出版的“中国新闻史”之类的书籍以及大量有关的篇什，也是斯处独悄然。我感到这个课题不光为一次填补空白的尝试，虽困难甚大确是功德无量。

无巧不成书，正在其时，新加坡华文报有个新闻代表团来上海访问，团长是新加坡《联合早报》总编辑、新加坡华文报业俱乐部主席黎德源先生。黎先生曾多次来上海，我以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负责人接待过他，有过不止一次的交往。一回生，两回熟，算是老朋友了。有天晚上，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与新加坡朋友聚会，我也作为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应邀切陪末座。我们谈到正在进行海外报业的研究，目前主要是关于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问题的研究时，黎德源先生等新加坡朋友都很关心和感到兴趣。彼此都乐于今后相互交流；黎先生还当场承诺俟返回狮城后即发出邀请，让我们到那边实地考察。

这次的知遇和话题真的成了我们进一步交往的纽带。在东道主的努力安排下，我和吴庆棠应邀去新加坡作客。感谢新加坡的报业同行，他们的确给了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毫无保留地提供资

料，有求必应地指点一切。连抄带复印，对庆棠同志来说，可谓踌躇满志，满载而归了。

而我觉得踌躇满志的，却在新加坡精神。这是一种无形的鼓舞和感染力量，使我对摆在肩上的指导任务，更具信心，也放得下心。我想吴庆棠也会有同感。我们常说：新闻工作者理应是“杂家”，新加坡这个特异的城国，就处处体现出这种气质。她有宽阔的胸怀，是各种文化和各种文明融合之地，多民族杂处一隅又各适其适，体现出远缘杂交的优势。和当地知识分子交谈，他们也以这种兼收并蓄的“杂家”风度引以自豪。当地一位名记者毫不讳言，说“我们是头骡子，兼备驴马的基因，所以适应力强。市场经济活跃，计划经济也有坚实基础，以社会主义之道还治资本主义之身。教育体制则是西方的一套，却有贯串着儒家为人处事的伦理道德意识。……”言下之意，不外乎说，他们善于取长补短。真的，在狮城一周短暂盘桓，所见所闻果然有那么一点意思。翻阅当地的三家华文报纸，就会令人惊讶：竟然百分之百的简化汉字，连大字标题和大幅广告，我也找不到一个繁体字。据说台湾、香港的同行都叹为观止。中国成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许就是这么一点意思吧。更有趣的是，新加坡朋友谈论起“当局”，包括李光耀先生，表示有所不满，认为太“专制”，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可是听得出来，微辞里并没有发牢骚的味道。甚至有所共识，欣赏人民遵纪守法的习惯，心安理得于“不自由”的种种。所有这些既矛盾又统一的体现，无不体现出“杂家”本色。因此，我以为缘此选中《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这个课题作为海外华文报业方面研究的首篇，用我们的行话说，不失为找到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典型。而新加坡报业的沿革与发展，乃至迄今华文报纸的欣欣向荣，无疑有其传统的一面，从中可以找到轨迹。

现在，《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一书即将出版。这部专著，从历史发展入手，以史带论，叙述了新加坡华文报业有史以来的重要

报纸及其沿革，以及重大事件和人物，脉络清楚，内容充实，立论鲜明，是一本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著作。

海外华人出版华文报纸，环境复杂，困难和障碍诸多。因此研究本题就要照顾到四面八方的关系，不能存任何偏见。为此，作者寓论史于资料（亦即用事实说话）之中，用资料来说话。该书着重论述新加坡华文报业的产生、发展与中国社会状况、文化传统的关系；以此为主题的专论，在我国海外华文报业研究领域尚属少见。

新加坡华文报业和华人社会分不开。“新闻即史”，从中可以窥见华侨历史的一个侧面，也可以窥见与中国的密切关系。这是新加坡华文报业史上十分突出的现象，也是中、新两国关系史上光辉的一页。作者不仅从历史沿革的各个方面详尽地阐述这种关系，而且从中国经济腾飞在亚洲及世界所产生的文化效应，中国的发展对当代新加坡华文报业繁荣的重要作用，指出并预示了当前困难重重的世界华文报业美好的前景，于此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为了解新加坡华文报业状况并收集资料，作者亲赴新加坡及香港作研究访问，因此，在专著中引用了大量报纸与报人的资料，其中许多鲜为人知，更难能可贵。

总之，我国对海外华文报业的研究起步较晚，而上海至今尚未见有关海外华文报业方面较有分量的专著。作者研究的这个课题，应该说是开拓性的。该书尚能付梓，不仅有学术上的贡献，而且对上海海外华文报业研究的拓展，具有带动性的激励的作用。中国有句老话，叫“抛砖引玉”；此书的问世，或许能够起到“引”的作用罢。不过，我们感到无比遗憾，为我们穿针引线的黎德源先生，来不及看到本书印行却于去年不幸因病离开了人间。缘悭一面，只好仅将此书告慰亡魂，以及我们最沉重的哀思。安息罢，黎先生！

林　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当我着手准备写这本书时，就像一个孤独的垦殖者，面对眼前一片荒原出神，各种思绪在心中闪烁、浮动……

自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我一直从事新闻采访编辑工作，担任过新闻记者，主编过杂志，以后才走进誉称社会科学殿堂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开始了新闻研究。

在广博深奥的研究领域里，我选择了海外华文报业与中国这一课题，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这也许是因为，我曾担任过新华社对外记者多年，经常接触到海外华文报刊，逐渐有所了解；还有一种先天的缘份，我出生在广东著名侨乡，那儿与海外联系十分普遍、密切与悠久，因而海外华侨华人的事在我心目中占着很重要的位置，他们的生存、发展以及同中国的关系，都是我所关注的问题；加上当时海外华文报业这一课题在上海社科院尚未有专门立项研究，属于一个新开拓的领域，很有探讨的价值。

海外华文报业是一个内容博大的课题，不少学者对其发展历史已作了许多研究。而我觉得，海外华文报业与中国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这些情况中国读者似乎了解并不多，资料又极为分散难觅。于是我便确定了以“海外华文报业与中国”为自己研究的总课题。

《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一书，便是这个总课题的第一个成果。新加坡同中国的交往历史久远且频繁，华族人口众多，华夏文化源远流长，华文报业发达。本书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以历史沿革为线索，对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的联系，作一次较为系统的整

理和探讨。今后,“海外华文报业与中国”专题研究将继续下去,分别对其他国家华文报业与中国的关系、发展变化进行研究,争取形成系列性的成果。

在我的专题研究及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林帆教授给予了许多重要且具体的指导,使我受益匪浅。

当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的研究开始时,我便得到了新加坡同行的大力支持。经新加坡《联合早报》前总编辑、新加坡华文报业俱乐部前主席黎德源先生的安排,我与林帆教授于1993年10月至11月间赴新加坡作研究访问。期间,新加坡华文报集团总经理周景锐先生会见我们,黎德源先生、《联合早报》副总编辑林任君先生,《联合晚报》总编辑陈正先生,《新明日报》助理总编辑郑文辉先生,新加坡国立大学著名学者王慷鼎先生、杨松年先生、崔贵强先生,老报人彭松涛先生,以及晚报的刘宏达先生、韩山元先生,早报的区如柏女士,《源》杂志的潘明智先生等,都给予了宝贵的帮助。回国后,《联合早报》高级副总编辑成汉通先生以及该报驻北京特派员林金发先生,仍很关心支持我的研究及专著的出版。

上海社会科学院及新闻研究所对这一专题研究很重视,将其列为社科院重点研究课题,专著完稿后,又获上海社会科学院黄逸峰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此刻,我感到,我并不是一个孤独的垦殖者。我得到了众多的热心支持与帮助。藉此,谨向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过关心和帮助的领导、老师、朋友深表谢意。

遗憾的是,在本书写作中,黎德源先生不幸因病逝世。这位热心中、新报业交流、对我的研究给予极大关心和支持的可敬朋友突然离去,令我心情沉重万分,搁笔良久。如今,在本书印行之际,倍加怀念黎先生;我想,本书的问世,是对黎先生最好的纪念吧。

吴庆棠

1996年7月16日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第一章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从中国到新加坡

18 世纪初，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的需要，开始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创办华文报刊。1833 年 8 月 1 日，英国伦敦布道会教士郭实腊在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华文月刊。这是在中国境内最早出版的华文杂志。

由于当时清朝政府实行严厉的禁教政策以及政局不稳等原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遂于 1835 年 8 月停刊。1837 年 2 月，该刊又在新加坡复刊，成为新加坡第一份华文杂志。

这种现象，无论在中国报业史上还是在世界报业史上都是较少见的。它揭示了中国报业与新加坡报业之间密切关系的历史，开了华文报刊在新加坡发展之先河。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首先在中国诞生，以后又迁至新加坡，一定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以下将对有关史实作些叙述和分析。

第一节　基督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中国同西方的交往源远流长，估计至少也有两千年的历史。随着这种交往，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广泛，而基督教则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内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直接导致中国和新加坡早期华文报刊的出现。

1

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东方古国，从来就是西方宗教势力向东方扩张的重要目标。

基督教最初传入中国是在3、4世纪。5世纪时，由于聂斯脱里派教士深入中国内地，使基督教在中国发扬光大。在428—431年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聂派创立者、叙利亚人聂斯脱留斯，由于别倡耶稣兼有人神两性的新说而被罢免大主教职务，并于435年被宣称为异端，驱逐出境。聂斯脱留斯带着信徒流亡波斯，建立总教会后，即向西亚、中亚传播教义。当时在中国的传教，是由成立于411—415年的赫拉特大主教区和成立于503—520年的撒马尔罕大主教区兼管的。

5、6世纪之际，景教已在洛阳正式传教，635年(唐太宗贞观九年)景教传入长安。是年大秦国上德阿罗本携真经到长安，唐太宗命人至西郊迎入宫内，译经传道。638年7月，唐太宗钦准传教，造波斯寺一所，度僧21人，阿罗本被波斯首都宿利城的景教总主教易朔亚伯二世派来传教。所以至635年以后便有了中国大主教区(传教)。744年，大德僧佶和到长安，将波斯寺统改为大秦寺。肃宗时，景教僧伊斯随大食、回纥援军入中国，利用得以和肃宗亲近的机会，重建灵武等5郡景寺，使景教在陇西、河西为之一振。直至845年(唐会昌五年)，景教被禁，该教在中国流传了200年。

845年唐武宗下令禁教后，波斯人景教徒都聚集在广州一地。878年黄巢军队攻占广州，外国人遭到驱杀，波斯人也不例外。景教从此在中国绝迹。如此惨痛的遭遇，并没有使传教者在中国国门止步。在元朝统治中国时，由于朝廷对宗教采取开放政策，罗马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致使基督教卷土重来，又在中国土地上广泛流传，成为在全国流行的宗教之一，在15个城有景教徒，主教驻地在西京大同。13世纪中叶，巴格达的景教主教有各教区主教驻节表，共列主教区25，西至亚美尼亚、阿拉伯、叙利亚，东至唐古特(河西)，北起汗八里(北京)，南抵印度，都属布教区域，其中在中国境内的教区就有4处。元朝复灭后，基督教失去庇护，很难有所发展。

明代中叶，随着葡萄牙的炮舰向东方扩张，天主教在中国重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取得了布道的机会。1557 年葡萄牙人强占澳门建立，耶稣会学校也在澳门建立，传教士开始叩击中国的大门。1562 年，皮莱士(Perez)和戴西拉(Texeira)神父便定居澳门，卡纳罗(Carneiro)任澳门第一任主教。澳门成为耶稣会在华传教的据点。

明朝万历年八年(1580 年)，意大利天主教徒利玛窦(Matthaeus Ricci)由澳门入中国传教。他交结官绅，攻读儒教经典，宣扬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作为传教的手段，终于 1601 年上北京，进谒明神宗，使中国打开接受天主教的大门。此后绵延二百余年，基督教再度兴盛。

天主教在中国发展至康熙年间，由于信奉天主教的中国教徒继续其祭祖尊孔礼仪，引起西方在中国天主教士的争议，导致罗马教皇干涉，于 1704 年发布禁约，不准中国天主教徒祭祖尊孔，并企图要清廷服从禁令，从而引起康熙反感，遂于 1717 年下令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康熙后，雍正、乾隆、嘉庆、道光都相继颁布限禁天主教的旨令。

另一方面，雍正继位后，为了保住皇位，以严酷手段对付政敌，致使受株连的天主教徒也被清除。在他登基那一年，下令禁教，除北京城外，不准任何传教活动，所有教堂，一概没收。乾隆对天主教也严加取缔，内地教士，一经查出，轻则驱逐出境，重则正法。

1773 年耶稣会解散，天主教活动在华进入低潮。

从 3、4 世纪到 18 世纪，西方传教士不惧怕严厉的禁教政策，通过各种手段，直至依附殖民者的炮舰，一次次叩打中国大门。他们把中国视作传教的重要目标的原因，首先是适应殖民者的对外扩张，掠夺原料基地、争夺商品市场的需要。中国地大物博，自然成为他们征服的重要目标。西方传教士有的就成为殖民者侵略行动的先锋和奴役殖民地人民的帮凶。其次是中国辉煌的文化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耶稣会创始人之一的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是最早奉派到印度、日本传教，也是首先在中国

开教的。他在1549年8月15日到达日本鹿儿岛。但日本素来奉行由中国传入的佛教和儒学。在日本，沙勿略会见了文化极高的中国人，促使他下决心向中国传教。“因为中国人真心皈依之后，日本人便自然会扬弃从中国传去的邪说了”。[①] 在西方传教士看来，征服了中国，其他地方便会不攻自破。

被称为耶稣会来华传教先驱的沙勿略从日本鹿儿岛回到印度的果阿之后，于1552年4月14日又从果阿奔赴中国，8月到达广东上川岛，因明朝海禁甚严，只得在离广州30海里的上川岛居留，伺机深入中国大陆，但他没等到机会，不久便在该岛的一个茅棚中去世。

东来的基督教士很早便在东西方交通要冲马六甲活动，天主教在16世纪即流传马六甲，新教会于1815年在马六甲发展。1819年，英国殖民者莱佛士到达新加坡时，这些教士即随之而来。等到中国开放，允许教士进入时，马六甲和新加坡两地的教会便移至中国。至1847年，英国伦敦布道会的人员全部离境。因为鸦片战争后，布道中心便北移至香港。

2

西方教士在中国传教，除了译经布道外，就是出版书籍，创办报刊。在翻译经典、著书立说方面，利玛窦及以前在华传教士已做了大量工作。早期景教大德景净译经最多。敦煌鸣沙山石窟发现的景教经文抄本有5、6种。《敦煌石室遗书》中《尊经》说：大秦本教经典530部，景教僧景净已译30部。

利玛窦来华后，研习中国经籍，以此著书立说，宣传天主教义，生平著作20多种，有《天主实义》一、二卷，《畸人十篇》，《辩学遗牍》等。其中《天主实义》是利玛窦宣扬天主教哲学的代表作，也是他熔儒家学说和天主教义于一炉的重要著作，在明代官绅和知识

①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6页。

分子中有广泛影响。学术著作的编译，有《几何原本》6卷，《同文指算》11卷，《测量法义》1卷，《圜容较义》1卷，《乾坤体义》2卷，《西字奇迹》1卷，和《坤舆万国全图》①。

利玛窦以前来中国的西方教士只是在宣扬教义，并以著书立说开展传教活动；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华文报刊，则是到19世纪初期才开始的。

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初，英国伦敦布道会派遣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中国传教，从而开始了基督教在中国活动的新阶段。

马礼逊入华重振基督教并非易事。自雍正、乾隆两朝实行严厉的禁教政策，至嘉庆(1796—1820年)、道光(1820—1851年)早期，仍然继续执行，并且颁布新的禁教法令。比如1805年北京城内清除基督教残余势力，1811年嘉庆皇帝再度下诏禁教，重禁外人传教及刻印基督教宣传文字，违者处以重刑等。这些严刑酷法，使得马礼逊入华传教活动困难重重。

马礼逊入华时，既勇于冒险，又十分耐心。他选择了澳门作为跳板，当时澳门是西商入华的歇脚点，清政府对西人在澳门的活动比较宽容。1807年9月，马礼逊冒险进入广州，不足一年，由于清政府与英国发生纠纷，所有居住在广州的英国人都被勒令移居澳门。马礼逊因而也回到澳门。他并不死心，变换了手法，搞了个伪装，于1809年2月，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中文译员的身份作为掩护，再度进入中国大陆继续传教活动。清政府对外人的传教活动严密监视，马礼逊终因秘密传教被勒令出境，潜居澳门。

马礼逊势单力薄，英国伦敦布道会决定于1812年9月增派年轻教士威廉·米伶(William Milne)前往澳门，协助马礼逊，推广

①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370页。

工作[1]。米伶的东来，在以后创办华文报刊的活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米伶东来也难有立足之地，先到澳门，因受天主教徒的挑衅，被澳门葡督迫令24小时内离境。米伶7月20日进入广州，为了避免清政府的注意，闭门在家中学中文，根本无法传教。

1814年初，马礼逊遣派米伶到马来群岛一带（包括爪哇马来半岛如槟城等地）进行考察，并乘机散发马礼逊编印的基督教宣传文字。

经过8个月的实地查访，米伶获得了第一手资料，于1814年秋回到广州，向马礼逊提出报告。经过讨论、比较，他们选定马六甲作为今后传教基地。其理由是当时的马六甲属英国管辖，在当地进行传教没有政治阻力；当时的马六甲，不但已是东西方交通的中枢，同时也是中国与南洋交通的主要站脚，更是马来群岛一带交通贸易的集散中心，对于联络及将来推广宣教工作非常有利；马六甲当时已有华人4000，正是传教士入华之前，学习华文华语的理想地点[2]。

1815年初，马礼逊再派米伶到马六甲，设立印度以东布道会，正式开始基督教在马来半岛的传教活动。

第二节 传教士办报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出现

19世纪初，在华基督教士活动的南移，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在东南亚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最直接且最明显的结果，便是促进了早期华文刊物的出现和一批华文刊物的兴起。

1

1815年初，米伶夫妇离开中国赴南洋，至该年8月，一本有

① 王慷鼎：《新加坡华文报刊史论集》，第12页。

② 王慷鼎：《新加坡华文报刊史论集》，第13页。

四、五十页的华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察世俗》)便创刊问世,从准备到出版只有短短半年左右。

远道而来的英国传教士米伶,在这么短促的时间里便创办出具备近代杂志特征的华文刊物,其成就是惊人的。分析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其一,米伶南移时,可能已经有了办报刊的明确目的。马礼逊在广州时,一方面忙于编写出版基督教的宣教文字,另一方面积极积累资料,为出版刊物之用。后被清政府发现,将他的资料全部烧毁。这说明马礼逊已经在作出版刊物的准备,只是因被清政府发觉而受挫。

米伶被马礼逊派遣去南洋群岛建立传教基地,在他动身之前,马礼逊面授机宜,指示他到马六甲后,立即出版一个宣传教义的刊物。马礼逊与米伶有个共同认识:除口头布道外,创办一个宣传基督教义的刊物很有必要。马礼逊不长住马六甲,因而马礼逊是《察世俗》的创办人,而米伶任主编,处理杂志日常编辑出版事务。

其二,米伶热心宗教事业,博学多才。1812 年来中国后,他潜心学习中文,博览群书,了解中国国情民俗,因此他担任《察世俗》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得心应手。

其三,米伶是有备而去的。他赴南洋时,并非孤身一人,而是带了两名助手—蔡阿国和梁广发同行。蔡、梁都是刻工高手,对《察世俗》的出版,起了很大作用。

米伶等人一到达马六甲,即开始紧张的筹备工作,不出两个月,便办起了印刷所,使《察世俗》能够在 8 月 5 日顺利问世。

《察世俗》出版以后的情况不错,发行量逐步上升。据麦都思的记录:1815 年每月 725 份;1816 年每月 850 份;1817 年每月 800 份;1818 年每月 520 份;1819 年每月 1000 份;1820 年每月 2000 份;1821 年每月 2000 份。分发地区,除马六甲、槟城、新加坡以外,

还远及爪哇、澳门和广州等地[①]。可见这份杂志在逐步发展，影响不断扩大。

自1815年8月《察世俗》开东南亚华文杂志之先河后的十多年间，先后又出现过两种华文杂志。这就是麦都思于1823年7月在巴达维亚编辑出版的《特选撮要》月刊，距《察世俗》停刊(1822年2、3月间)仅一年又4个月的时间。3年后，于1826年停刊。过了两年，即1828年，在马六甲出版了中文月刊《天下新闻》。这份杂志由西商与印度以东布道会联合出版，由纪德担任主编，于1829年停刊。

2

马礼逊、米伶、麦都思、纪德等教士在东南亚的马六甲、印尼所办的华文杂志，都是以向中国宣传宗教为宗旨的。中国乃传教的目标所在，当他们一时还不能在中国直接开展传教活动之时，这些传教士便通过传播媒体，间接地向中国传教。

米伶在《察世俗》创刊号中自述办报宗旨称："本报虽以阐发基督教义为唯一急务，然其他各端，亦不敢视为缓图而掉以轻心。知识科学之与宗教本相辅而行，足以促进人类之道德，又安可忽视之哉。中国人民之智力，受政治束缚，而呻吟憔悴无以自拔者，相沿迄今二千余载。一旦欲唤起其潜伏之本能而发扬蹈厉，夫岂易事。惟有抉择适当之方法，奋其全力，竭其热忱，始终不懈，庶几能挽回于万一耳。作始虽简，将毕必巨，若干人创之于前，若夫发挥光大则后之学者责无旁贷矣。"[②] 麦都思在《特选撮要》发刊词中称，该刊将继续《察世俗》的宗旨。

这3家杂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力求适合中国读者的口味。介

① 王慷鼎：《新加坡华文报刊史论集》，第17页。

② 郑文辉：《新加坡华文报业史(1881—1972)》，新马出版印刷公司1973年版，第8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